

传统在现代空间的重构与发展

——以安阳桥庙会为例

◇周瑜

摘要：安阳桥庙会历经几百年依旧充满生气，如今，传统庙会中糅合了诸多现代化的因素，一方面发展了传统习俗，另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庙会规模的扩大，进而延伸了庙会的生命力。本文试图从安阳桥庙会的规模、习俗、庙会中交易的物品的变化以及当地政府的介入等方面来说明传统与现代如何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发生交融与碰撞，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庙会 传统 现代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与程度日新月异，许多城市都处于城市拆迁、旧城改造的声势浩大的空间生产的进程中。然而因拆迁改造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加剧。Li Zhang在《Contesting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Socialist China》这篇文章中提出政府试图通过建造一个现代社会的建筑或建筑群，来推进现代化，政府在摧毁传统建筑时，也试图保护，但是这种仿古也是按现代社会的购物或公园之类的地方的逻辑建造的，结果破坏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脱离了人们的生活。暴露了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国家盲目追求现代化，政治制度在空间重建过程中的一些弊病。

安阳桥古庙会也经历了同Li Zhang文中提到的昆明旧城古建筑相同的命运——由政府破坏到保护，再到积极推广的过程。庙会从发起到兴盛，经由衰落到再发展壮大，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庙会由最初自发性组织到由国家建构，与传统建筑被国家摧毁后又由国家保护的方式如出一辙。但古庙会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反而在当今社会空间中占有了一席之位，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本文以在城市空间中日益壮大的传统庙会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的不同阶段庙会的演变进行探索，分析了在城市化加快的城市空间中，受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影响，庙会民俗并没有消失、反而生机盎然的原因。揭示了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变化过程中起到的促进作用。

一、传统庙会仪式空间的特点

安阳桥位于安阳城北洹水上，建于元至元二年。过去附近有三座庙，南端带石牌坊的大王庙，桥北有南顶老爷庙，桥东南是关帝庙，三座庙成三角形分布。现在洹河沿岸是近些年新建的商品观景房，但每年正月十六，庙会以安阳桥为中心向四周扩散，附近几个村落的空间会被传统庙会完全占据。

庙会因庙而起，安阳桥庙会的主要场地却随着三座庙宇香火交替旺盛而发生转移。古庙会主要形成于明朝中后期，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洹河的漕运发展起来，安阳桥成为豫北最大的水陆码头，是向天津卫输送棉花、药材、洋油的交通要道，附近村庄的农民就开始以撑

船、开商铺等营生。最早的庙会主要围绕洹河南岸的大王庙进行，撑船的人们为求得金龙大王的保佑，保佑自己行船平安、事业兴旺，就在每年正月十六给大王叩头，由此开始慢慢形成庙会。最初的庙会虽然没有固定的范围或界限，但人们有关庙会的活动也很简单，所以庙会初期的规模只是连接三座庙宇的道路空间。1937年，日本人来到安阳后，烧毁了安阳河上的货船、拆毁了大王庙，围绕这座庙的正月十六庙会开始向安阳河北岸的关帝庙转移，主要是附近的商家为求得关羽的庇护，继续在农历正月十六举行供奉活动。

当时的庙会主要以叩头敬神为主，伴有村民自发组织的“换佛”、“酬神”的民俗活动。庙会与敬神随活动的进行而不断变换空间位置，在表演民俗时，会（集市）与表演队伍交替占用空间；表演结束后，庙会在短时间内占领全部空间，如同表演开始前一样。

二、庙会空间范围的改变

文革期间，受到“破四旧”的影响，庙宇及戏楼遭到拆毁，庙会中许多活动被迫停止。正月十六当天，庙会主要是保留了交易市场的功能，传统的表演活动被迫停止了。这一时期传统建筑受损严重，大王庙及关帝庙前的关帝庙作为村委会的办公室而保留了下来。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模式以市场信号为主，在完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安阳市在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南顶老爷庙因占据了大面积的商业价值的土地而被拆，庙会所占据的城市空间逐渐缩小。

传统社会中，寺庙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百姓精神信仰的寄托，也丰富了群众的生活，庙会更是人们进行情感与物质交流的一项重要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的迅猛提高，人们的消费、娱乐空间日益丰富，现代化的加快，人们不再需要通过神、庙来获得心灵的慰藉。庙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导致了庙会空间范围的明显变化，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庙会来进行物质交换、放松身心，庙会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中心。

三、传统庙会在现代空间发展的动因

受到国家政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安阳桥古庙会在某

一历史时期的确进入了停滞甚至衰退的阶段，但并没有完全消逝，反而发展成为了豫北地区最大的庙会。一方面是庙会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以及经济的发展对其在现代空间中能生存并发展壮大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一）政府的支持成为推动庙会发展的动力

庙会从兴起到建国前，一直由民众自发组织开展。建国后，安阳桥村成立村委会，村委会成立后就立即介入到庙会的管理之中。这时的庙会依旧主要是按人们的习惯和“地缘”构建而开展。但是国家力量的介入使得庙会情况变的复杂，以往以民众自发的开展的庙会因为村委会的出现使得庙会不再专属于村民，成了从村民以外的城市、政府庙会的新局面，庙会中民众的组织力量减弱。但村委会的也对庙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村委会成立后，首先在关帝庙前搭建戏楼，文革期间遭到拆毁，又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桥北头的南顶老爷面前新建戏台，同时恢复了庙会当天的表演活动。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新戏台最终也被拆除。但村委会在其办公楼前搭建了戏台，把每年的表演活动延续了下来。

到了2000年，庙会规模的迅猛壮大，单靠村委会的已经无法掌控当日的局面，而庙会在管理上的脱节和失序，诱发了许多不安全因素。因为庙会当天人流过于集中，秩序混乱，踩踏事件、偷盗案件屡见不鲜，甚至发生了有人被挤下桥去的事故。这些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安阳市政府也参与到庙会当中，加强了对庙会的管理，由区政府对庙会进行规划、管理。北关区专门设立了庙会指挥部，每年指挥部会出台“庙会应急方案”，确保庙会期间各种突发事件可以得到有效应对。一些部门也抓住庙会的宣传契机，向广大群众宣传禁毒、计划生育、消防等知识。

同时，政府也作为庙会空间的规划者出现。安阳桥老庙会的范围主要是围绕着三座庙宇和周边的道路为主，并没有具体固定的边界。为了使庙会的布局更加合理有序，政府开始实施管制，把庙会圈定在以安阳桥为中心、沿城市道路呈放射状扩散。虽然以“管制”为名，其实政府在划定范围时不自觉的给庙会留出的空间逐年加大，庙会规模也顺势扩大。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2008年，安阳桥庙会被评为第一批安阳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手工艺人也开始在庙会上摆摊，向人们展示各种传统工艺。这一举措，不仅保护了庙会，也为其他非物质遗产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让人们更深切的感受非遗的风采。

（二）商贸、娱乐等活动推动庙会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逐渐融入市场。由于庙会中各种活动的举行，吸引了大量的人流，短时间内突然的人口聚居，让许多商家看到了商机。在市场经济这个新时代背景下，庙会作为一种旧有经济模式焕发出不同以往的新鲜生命力。

最初的庙会规模只有从南岸的大王庙到桥北头的南顶老爷庙，长不到300米。桥上只是有些小商贩出售生活用品、劳动工具，买的人也寥寥无几。人们有了剩余可支配

的财产后，庙会上的交易物资日渐丰富了起来，除了人们日常所需用品外，各种风味小吃、服装饰品、花卉鱼虫也开始出现在庙会中。近几年，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台，传统的民间工艺也有了展现的舞台。现代化和市场化也为庙会注入了新的内涵，商家们当然也不会错过这绝好的机会，从最开始的酒类、冷饮类扩展到教育机构、旅游公司，到现如今的房地产、证券公司、投资公司，汽车销售、装修公司等都出现在庙会中。

由庙会而产生的商品交易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空间组织，以庙为中心及周边地块构成的庙会具有开放性和容纳性，使得各种商品夹杂在这一传统空间中。同时庙会不收取门票，进入门槛低，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的交易空间，所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商贩前来参与。

庙会当天的娱乐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民俗表演，街舞、露天KTV、知识竞猜等现代化娱乐项目也融合在庙会传统的空间之中。

四、结语

庙会包含了长久以来积淀的信仰崇拜，又成为旧传统在新时代的映射。当传统的庙会伴随着时代发展、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而遭遇“国家在场”时，作为传统的庙会如何得以存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庙会的运行秩序产生的影响。政府和相关机构作为“国家”对庙会这个仪式最直接的代理人，在庙会的发展变化中展现出一种特殊的轨迹，从隐形到出面，从无为到出手，都显示出现代庙会越来越和国家密不可分的现实。“国家”不仅对庙会进行方向性的引导，作为庙会的组织者、管理者、维护者、调配和规划者的身份依然是今日庙会得以存在和进行的保障。

庙会是现代人们接触传统的最直接方式，人们在祖辈一代代传下的民俗中感受着传统的魅力，又将许多现代因素注入庙会之中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以现代主义规划的城市空间功能区分可能过于明确，而庙会以其特有的复合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对现有城市空间进行了有益补充，加之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为庙会在现代化城市空间中的再生提供了空间，使庙会的发展壮大成为了必然。

参考文献：

- [1] 刘宇, 韩春雨. 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专题研究, 2012 (11)
- [2] 陈宁, 周炳中. 城市化进程下的旧城改造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市场经纬, 2007 (01)
- [3] 李东泉. 政府“赋予能力”与旧城改造. 城市问题, 2003 (02)
- [4] Li Zhang. Contesting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Socialist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47, Number 3, June 2006.

作者简介：

周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民俗学。